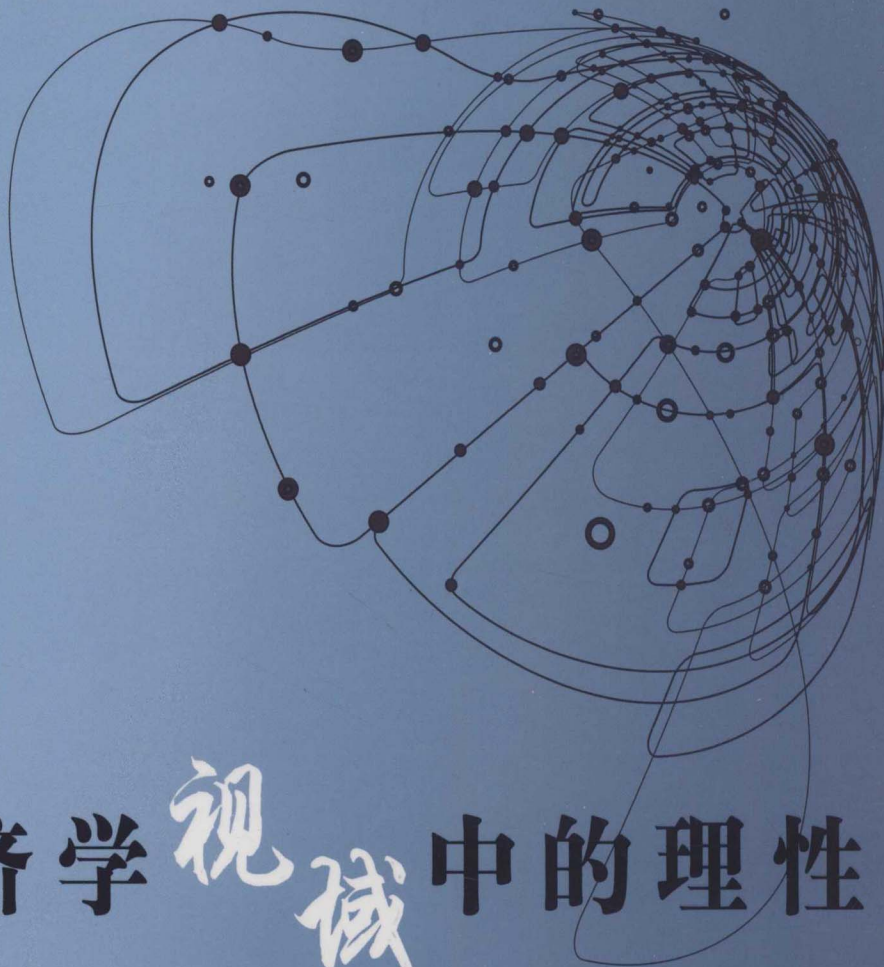




经济学视域中的理性

JINGJIXUE SHIYU ZHONG DE LIXING

景玉琴 著

 人民出版社

014035837

F0
501



经济学视域中的理性

JINGJIXUE SHIYU ZHONG DE LIXING

景玉琴 著



北航

C1723125



人民教育出版社

F0
5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视域中的理性 / 景玉琴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1-013132-0

I. ①经… II. ①景…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8176 号

经济学视域中的理性

JINGJIXUE SHIYU ZHONG DE LIXING

景玉琴 著

策划编辑: 张肖旻

责任编辑: 巴能强 张肖旻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3132-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本书由吉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序

理性假设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是经济理论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理性假设的核心内容包含两个基本方面：完全的理性能力和自利最大化。然而，由于这两个核心内容均不能很好地契合现实，所以若干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它们的修正。人们对理性假设的批评和修正主要沿前一理论向量进行，表现为有限理性对无限理性的取代；相比之下，对另外一条路径即自利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却进展缓慢，景玉琴博士所进行的研究即着力于探索这个问题。

人的行为基本可分为自利和利他两类。经济学理性除了解释自利行为外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利他行为实际上决定了经济学的边界。利他行为包括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萨缪尔森对效用重新表述的基础上提出效用函数可以无限开放——能纳入效用函数的事物多种多样（个人声誉、权力、友谊、爱、他人的尊敬、自我的表现、甚至别人的福利，等等），试图将三种利他行为均纳入利己模式。仔细推敲起来，这种广义的效用解释模式其实陷入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进化理论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提出的“包容适应性理论”，从基因层次解释亲缘利他行为；美国哈佛大学的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提出的互惠利他理论，从“利他→利己”角度解释非血亲利他行为。这两种理论可以将部分有回报的利他行为纳入利己模式，但仍然无法解释纯粹利他行为。对于纯粹利他的道德行为能否纳入自利最大化理性框架问题，还未见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传统经济学要么把道德行为归入非理性，要么不承认道德行为，以利



己来统一利他，把人的个性完全抽象掉，当作无差别的数据来处理。而社会越是发展，人的行为越是多样化；物质越是富足，人的“个性”越是彰显出来。景玉琴博士的研究试图把数据还原成人，通过分析个体差别反映人的真实，从而深入挖掘经济理性的生成与演化机制。本项研究具有深刻的学科发展意义，作者也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个人观点，概括如下：

第一，传统的经济学理性是“点理性”，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极端——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本书作者提出，经济学理性是层次理性，是区间理性。传统经济学理性假定仅承认“利己”，是初级层次的理性，其内涵必须随社会进步予以拓宽；中级层次的理性行为的下限是利己不损人，上限取决于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境界；纯粹利他行为属于高级层次的理性行为，不能因为其还不是当今现实社会的常态就将其归入“非理性”。

第二，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解决自利与利他的矛盾需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内生利他行为并非特例或偶然，道德内化于理性的必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对有意破坏合作规则的行为怀有天然的憎恨，并有身体力行去惩罚此种行为的愿望。作为个体的人的行为不完全受到自利倾向的影响，也受公平和互惠等道德观念的影响；完全自私的个体之间无法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而包括各层次理性者在内的社会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可以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

以上观点通过作者所发表的系列学术论文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据《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统计，景玉琴博士的学术论文被广泛引用，H指数达到14，这对于一位青年学者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作为博士后合作导师，我为她如此毅力之韧、品格之坚地进行学术求索并能取得这样的学术认可深感欣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希望景玉琴博士再接再厉，取得更丰硕的科研成果！

吴超林

2013.10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经济学理性的渊源及理性范式的争议·····	34
第一节 经济学研究的理性传统·····	34
第二节 经济学理性范式的争议·····	44
第二章 理性范式的两个进展向量·····	59
第一节 对无限理性的修正·····	59
第二节 对自利最大化理性的修正·····	67
第三章 根植于社会规约的经济理性·····	78
第一节 社会规则系统与经济理性·····	78
第二节 经济学理性属于层次理性·····	87
第三节 对行为人理性层次的判定·····	98
第四章 经济理性的形成机制与道德本位·····	105
第一节 经济理性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	105
第二节 经济理性的道德本位·····	128
参考文献·····	140
后记·····	154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动因

随着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快速发展，其前提假设基础的真实性问题日益受人关注，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

第一，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是一个重要而又颇受争议的问题。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讲的经济行为假设条件，很多学者心存疑问。这些假设包括：（1）不存在不确定性。即使存在不确定性，也可以预知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2）行为人具有可以确定的效用函数；同时行为人具有同质性以及一致的偏好体系。（3）选择结果具有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和前后关系独立性。描述不变性要求行为人选择的先后顺序不应依赖于所描述或显示的选项，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经过再三思考，将两种描述视为同一问题的同义表达，那么它们必定导致相同的选择；程序不变性要求不同表达方式的等价学说揭示相同的偏好次序；前后关系独立性指一项选择与其他替代方案互为独立的原则。（4）行为人具备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不存在感性因素对选择的干扰。（5）选择意味着在备选方案集中进行比较和挑选，所选方案是最优的，即能给决策者带来最大效用的。



(6) 一个确定的报酬函数, 即行为人可以确定地赋予每项行动结果一个具体的量化价值或效用。(7) 确定性的结果, 行为人可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或最优目标。

这些假设与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远, 很多人对此提出质疑。这就是理性选择的经济学吗? 行为人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 通过比较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 总能从中选择那个净收益最大的行动方案? 这哪里是现实社会, 简直就是机器人世界!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 (Geoffrey Leech) 在其著作《语义学》中描述过一个机器人社会: 每个机器人都能发出和接收某种信号, 即“机器人语言”, 然后可以进行严密的逻辑计算, 每个机器人的行动都是最优选择的结果, 在最优选择中, 机器人世界也达到了理想状态。(利奇, 1987)

现实中的人不是机器人, 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感、信仰追求, 而这些都被排除在经济学理性考虑之外。这样的假定虽然在特定意义上有利于经济学家进行逻辑分析, 但同时也使经济理论日益脱离现实经济生活。科斯曾把 20 世纪初形成的主流经济学称为“黑板经济学”, 这样的经济学只注重抽象的演算, 忽视现实的经济现象, 如同闭门造车。现实的情况是, 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 人们的理性认知受到心理和生理上思维能力的很大限制, 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对主观心理活动产生着重大影响。同时, 除了维护自身利益外, 人的心中还有一些位置是留给利他主义、忠诚、公平和对别人的回报愿望的。比如, 在一个“团体交换”实验中, 每个实验主体都得到了同样数目的货币, 要求他们对于一个公共项目投资。每个人的投资额保密, 并告诉他们, 投资完成后, 所有人不论是否投资, 都将平均分配投资收益。按经济学理性假设判断, 投资不会发生。但实验结果是: 实验主体平均投资了初始货币额的 40%—60%; 重复实验的结果也表明, 投资比例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虽然在下降, 但不会为零。实验中还出现了一个有趣

的“重新开始效应”，即每当宣布实验重新进行多少次时，下降的投资水平又回升到40%—60%。实验说明，尽管“搭便车”行为会压抑人们的投资热情，但愿意为公共事业尽力的心理是客观存在的。再比如，每当遇到地震、洪水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时，人们的自愿捐款、自愿献血、自发救助行为所表现出的利他主义高尚情感，都不是教科书上的经济学理性所能解释得了的。

除利他行为广泛存在外，理性反常也很普遍。按照经济学理性假设，行为人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并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即使存在不确定性，行为人也能通过概率来判断比较各种可能方案的预期效用。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最直观和典型的例子就是证券市场，证券价格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比如投资者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都会导致证券价格剧烈波动。被席勒称为“非理性繁荣”的纳斯达克网络股价狂飙时代，就是投资者对网络企业前景过度乐观的结果。

此外，偏好反常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经济学理性假设行为人具有完全的控制能力，其偏好是连续的、稳定的，因而不改变的。但实际上，人们的偏好并不是连续的、稳定的，人们往往知道何为最优化，却因为自我控制意志力方面的原因无法作出最优选择。这一结论是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在1979年发表的《期望理论》中提出的，并于1990年做了如下实验：第一步，要求实验群体在两个期望值相同的赌博中进行选择，一是可以一个小概率赢得大奖，即赌局A，比如以 $1/9$ 的概率赢得40美元；二是以较大概率赢得小奖，即赌局B，比如以 $8/9$ 的概率赢得4美元。结果有70%的人选择了赌局B。第二步，要求上面的实验主体给两个赌博定价，让他们标出愿意出售两个赌博的各自最低价。结果有68%的人对赌局A给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实验发现，在实验前期人们偏好赌局B，而在后期却偏好赌局A。这种被称为“偏好颠倒”（preference reversal）的现象说明，人们并不拥有事先定义好的、连续稳定的偏好，偏好是在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并受判断和选择的背景、程序的影响。



与经济学理性假设相冲突的情况不胜枚举。“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解释政治生活，解释其主要的情绪，诸如愤怒、骄傲、羞愧上是不充分的，而且在解释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也是不充分的。”（Fukuyama, 1995）文化研究者指出，每个民族都有一些非理性的传统行为方式。比如中国人的家庭优先的观念，日本人对非血亲的收养观，及其不囿于血亲的“家”的观念，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社群倾向，这些都不是理性导致的行为。然而理性选择理论家这样反驳：这些未必不理性；人们之所以作出这些看起来非理性的行为，是因为信息少，搜寻更多信息的成本很可能高于所得的利益；要求人们事事理性，本身就是不理性，传统文化所导致的行为在该情境中是理性的。（Fukuyama, 1995）那为什么这些传统行为方式在已经不合时宜，需要与时俱进时，仍迟迟不肯更改呢？原因只有一个，理性行为不是唯一的行为方式，在其之外还有很多行为方式，习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甚至为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理性也并非时事事都是最好的选择，在很多情境中，习俗行为优于理性行为。每个个体在每件事情上都诉诸理性是不经济的。他只能在少数事情上訴诸理性，而在多数事情上依赖习惯。习惯往往更多地是来自他人的、社会的经验。如果每个人在每件事情上都要依个人的理性去认识、摸索和解答，人类社会的进化不会超过动物许多。（郑也夫，2000）经济学家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重新认识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同时也是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人格特征。

第二，经济学理性过于强调人的自利倾向，甚至认为利他也收敛于自利，令人难以接受。以人的自利性假设为理性出发点解释经济现象的思路，是贯穿亚当·斯密之后数百年全部经济理论的最基本脉络。在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他把代表古典学派之综合的穆勒的方法论、边沁的功利主义心理学和他自己非常热爱的数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他在书中指出，经济学是“效用和自利的力学。……以最小的努力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以我们所厌恶的最小代价保证我们所希求的满足最大量，换言之，使快乐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的课题（Jevons，

1965)。这时候的经济学还是“以最小的努力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到了贝克尔那里，已经明确到用最大化方法研究各种社会现象。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1976年出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影响很大。贝克尔在这部书中说道：“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其分析方法就是：“更明确更全面地假定最大化行为，假定家庭、厂商、工会或管理当局的效用或福利函数能够最大化。假定存在着不同效率的市场以协调各方参与者。假定人们（的）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解释经济行为，而且可以解释“语言的进化、出席礼拜频次、死刑、法律制度、动物绝种，以及自杀、离婚率，等等”。一言以蔽之，“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贝克尔，1976）换言之，理性的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所谓效用，只不过是行为主体实现自身偏好所感受到的一种心理状态。偏好既有“利己性”也有“利他性”，只要这些偏好能满足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和连续性假定，就可以对其进行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效用特别是广义效用，几乎囊括了人的一切偏好，包括道德的和反道德的。把追求自利最大化理性扩展为效用最大化理性，扩大了理论的解释范围。例如现实中许多人并不追求物质利益或金钱的最大化，他们追求道德情操，千金不易甚至至死不渝，还有许多大公无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都是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最终，经济学可以用最大化解释一切行为，包括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纯粹利他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家给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赋予了过多功利主义心理学因素。凯恩斯在1927年曾敏锐地指出，穆勒、杰文斯、（19世纪）70年代的马歇尔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埃奇沃思都曾经信奉功利主义心理学，把经济学的基础置于这种信念之中。（Keynes，1927）

用效用最大化来定义理性，行为人则完全被一种偏好关系所替代。在马斯克莱尔的经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全部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分析



开始于一个关于理性的简单定义。理性被完美而准确地数学化为完备性（completeness）和传递性（transitivity）两种性质。显然，这种理性的偏好关系来自于何处，人为什么具有这种理性的偏好关系，为什么具有自动偏好选择性，则不再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他们简单地将此归结为一个“内省过程”（process of introspection；Mas-Colell, Whinston and Green, 1995）。经济学仅仅需要考察依据这种理性假设建立的理论是否精确，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解释人的行为，这当然给经济学家的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自此以后，无须再考虑经济人的理性究竟动机如何，更无须考虑人性又是如何，只需知道经济人确实理性地在某种约束下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就可以了。为了更便利，经济学家引入了“偏好”这个概念替代了对目的本身的解释，顺利实现了理性假设的基础从功利主义心理学向现代行为主义的转变。正是依靠这种转变，经济学成为价值无涉的，成为用一个分析框架解释全部人类行为的学科，当然了，也成为被人质疑最多的学科之一：不断扩展自利的定义范围确实可以以诡辩的方式避免出现解释盲区，但这无疑使经济学陷入一种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杨春学，2005）

近年来，许多人对这种把追求自利最大化理性扩展为效用最大化理性，从而构造解释全部人类行为的分析框架的做法深感怀疑：这种无所谓道德不道德、无所谓高尚与卑劣、无所谓好与坏的区分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的吗？

20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敏锐地思考了有关人的哲学，并提出了新的人性假设。他依据的是生物学家的发现：任何生物体均具有两套系统——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靠着前者，生物体接受外部刺激；凭着后者，生物体对这些刺激做出反应，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生物的功能圈。卡西尔通过研究指出，除了在一切生物种属中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以发现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第三个系统——“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活。因为有了它，人类不再单纯生活在一个物理宇宙之中，同时也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

宙之中。这一符号宇宙即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语言、宗教、神话、艺术和科学等。卡西尔修正和扩大了自古希腊以来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看法。他指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卡西尔，1985）在卡西尔看来，与其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不如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符号”是其表象形式，“文化”则是其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符号的动物”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的动物”。用卡西尔自己的话来说，符号是“人的本性之提示”，文化则是“人的本性之依据”。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描述或者定义的话，那么这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可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既不能像古希腊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也不能像近代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卡西尔认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卡西尔，1985）按主流经济学的理解，这所有的“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都指向一个圆心——效用最大化，那么，以点带面（或者可以说是以偏概全）就可以构造解释全部人类行为的分析框架。

这种推而广之的做法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接受。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也有其局限条件，真理再往前一小步就是谬误。置理性假设本身的局限性和现实性于不顾，把一个本该需要经验性认定的前提假设推向了绝对化的理论层面，并登峰造极地将其引至信仰的高度，成为经济心理学



论的“天然公理”，即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处于任何位置，都有着一致的“自利”性，不因个人差别、时空差别及社会环境差别而有任何变化，将由此得出的形而上学结论，无限制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侵入到其他社会学科之中，用于重新解释政治、法律、社会日常生活和宗教关系等，不但是不妥的，也是非正当的。所以，对经济学理性假设不能再当作天然公理加以接受，有必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理性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是其理论展开的前提和起点。作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前提和起点，理性假设为其建立精美严谨的理论体系、赢得“社会科学的皇冠”的美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基于理性假设的至关重要性，对其进行全面评价，厘清理性假设背后隐藏的对经济学本身及其结构、研究方法乃至哲学基础的考虑，从而对理性假设、对经济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有一个客观的定位和正确的认识，也就更有必要。

二、研究方法思路

研究经济学理性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马克思在其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要研究经济学理性这样的“社会联系”，研究“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就要研究“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为我们研究经济学理性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们知道，人类生产包含着两种类型，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人类的这两种生产，在结果上表现为双重关系，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自然关系主要指人类

在生产中同自然界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人客体化”或“生产者物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正是人类的这种生产中的合作关系，成为人类理性的最深刻的源泉。哈贝马斯（Jorgen Habermas）^①也说过：“‘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现出来的，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其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关联。唯有在这种关联中，单独的人才能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离开了社会群体，所谓自我和主体都无从谈起。”（哈贝马斯，2001）例如，利己动机必须在利他动机的约束下才能真正实现，源于社会的利他动机重塑着人的利己动机。人的利己动机源于人的生物本能，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但是人的行动却不完全是源于生物本能的行动，因为人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还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一个经历了社会化过程的人不仅具有先天的利己动机，还具有经过后天价值内化而形成的利他动机，后天形成的利他动机会约束和重塑先天的利己动机，由此决定着人们追求利益的方式和手段。尊重个体理性并不是要无条件地去满足个人利益，而是要在这个前提下，让人明白完善的理性是懂得让渡，能够考虑他人利益的理性。在利益休戚与共的社会中，只有理性个体在追求自身个体利益的同时考虑他人利益的制约，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才是统一的。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会使得理性个体在考虑内部个体利益的同时，顾及团体的整体目标，以集体利益来协调个人需要。所以，立足于人类的社会关系研

^① 尤尔根·哈贝马斯（Jo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塞迪尔多夫。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其理论涵盖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道德和法理论以及文化理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对源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始终没有放弃，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一段论述被他多次引用：“（传统理论）蔑视科学的现实社会功能，无视理论在人的存在方面应该做些什么，而只关心它在抽象领域中有何意义……今天，专业学者作为科学家，将社会下现实连同其产物视为外在的，……而批判的思维却尝试实地克服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法兰克福1971年新版，第243页；转引自：得特乐夫·霍尔斯特著：《哈贝马斯传》，章国锋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2页）。哈贝马斯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试图既强调理论的可操作性，同时又关注人自身的主体存在，以“交往理性”来达到社会的和谐。



究经济学理性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立场。当然，经济学理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生物学、基因学、民俗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因此，研究经济学理性，除了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外，还须借助上述多个学科来进行。只有对经济学理性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我们才能揭开经济学理性的神秘面纱，洞察和把握经济学理性的“内在、实质和真理”。

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经济学研究也有必要借鉴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经济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经济活动规律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自然也具有与其他社会活动相同的方面，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自然包含着研究方法的进步，经济学研究应该借鉴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凯恩斯曾说，好的或合格的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阿莱说：

“只有通过大量的综合研究，社会科学才能取得重要的进展。最需要的是具有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宽广视野的经济学家；具有经济分析能力和社会学研究能力的历史学家；以及受过经济学和历史学训练的社会学家。”（莫里斯·阿莱，2001）他提出，要把经济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联系起来。虽然，由于科学研究分工越来越细化，像配第、魁奈、亚当·斯密、马克思等那样能够同时成为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的确相当困难，但是了解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还是做得到的。

“应该抛开经济学作为显学的学科自负和运用了数学方法的方法论自负，认认真真地从其他社会科学那里学习思想和研究方法，唯如此，经济学才能有更大的发展。从当代西方经济学来看，真正对其经济思想库做出了更大的贡献的经济学家都是那些具有宽广的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以及更宽的知识背景的经济学家。我们在经济思想的积累方面处于落后地位，而大多数经济学家们在政治学、法学、历史学、人类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和在哲学领域的知识积累更为不足，只有改变这一局面才能使中国经济学迈着坚实的步子向前发展。”（曾国安，2005）